

全 品 精 人 词 大 十 代

苏
轼

精
品
全
集



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



苏 轼

●冷成金 选注 大连出版社

1998·大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邓绍基、周秀才、侯光复主编, - 大连:大连出版社, 1998.3

(月亮文库/康琳, 侯光复主编)

ISBN 7-80612-468-3

I. 中… II. ①邓… ②周… III. 词(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古代
IV. I2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203 号

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全 8 册)

邓绍基 周秀才 侯光复 主编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三河市科教印刷厂印刷

字数:2000 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89.5 插页 40

印数:0 001~8 000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许文彦

责任校对:贺素香 曲娥眉

装帧设计:北京羽人创

郝福明 贺素芝

意设计中心

ISBN7-80612-468-3/I·71

登记号:(辽)第 15 号

定价:142.00 元(全 8 册)



苏 轼 像

《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

主 编 邓绍基 周秀才 侯光复
常务副主编 康 琳
责 任 编 辑 许文彦
装 帧 设 计 北京羽人创意设计中心
插 图 绘 画 王国能

《温庭筠》卷	文 白	选注
《李煜》卷	张西平	选注
《柳永》卷	过常宝	选注
《苏轼》卷	冷成全	选注
《秦观》卷	张斌荣	选注
《周邦彦》卷	姚晶华	选注
《李清照》卷	韩传达	选注
《姜夔》卷	杨 燕	选注
《辛弃疾》卷	王树林	选注
《元好问》卷	石禾然	选注
《集外卷》卷		

前 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自古以来,诗歌创作繁荣,蔚为大观,诗仙诗圣,代不乏人。而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百花园中,“词”这种汉语诗歌的特殊形式,又有着与众不同的地位。以词创作而闻名的温庭筠、李煜、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姜夔、辛弃疾和元好问,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无人可以替代。无论是阅读、欣赏还是收藏,这十位大词人词作中的精品都是当之无愧的艺术绝品,堪称“国宝”。

《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11卷8册,选编了这十位词人的全部经典之作。其中,《集外卷》还汇集了自唐五代至清末除此之外其他作家的词作精品。若以单卷论,本书收入了中国古典词作十大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其中许多卷乃是迄今收词最多的选本。若从整体看;本书在时间上跨越了中国古典词创作的全部历史时期,几乎囊括了代表各个时期词作艺术最高成就的所有佳作名篇。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一般文学爱好者,而非文学研究专家。因此,其选注体例多从有助于阅读与欣赏着眼,不特别强调学术创新。选注过程中,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一不标新立异,二不作繁复辨析,只取多数学人认可之说。

本书每卷均含“作者小传”、正文和附录三部分。“作者小传”扼要介绍词人的生平活动和创作特色,使读者对作者的一生有个总体了解。正文中,每首词后一般都有“题解”和“注释”。前者主要介绍写作背景和抒情主题。后者意在扫除阅读中的语言障碍。如果读完本书后,读者还想对词人作更全面的了解,“附录”中的词人“生平创作简表”和“词作版本简目”可以起到引路作用——读者据此可以找到词人的其他选本或诗文集,进一步研读。

本书入选的词作均按作者创作的时间顺序排列,而且除温庭筠和柳永外,每个诗人的作品都按作者生平活动的阶段性或作品思想艺术的变化加以分期。这在其他选本中是不多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一般读者更好地把握每一首词作特定的思想内容。当然,词人的艺术创作是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不能截然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的任何一种理论上的分期都会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待于学术界从其他角度再去完善或弥补。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了学术界、出版界许多专家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管士光先生和北京出版社的李志强先生。没有诸位专家学者及同仁的热情相助,本书是不会这么顺利出版的。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苏轼的 思想与词的创作

苏轼(1039—1112),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苏洵长子。宋仁宗嘉祐元年,他与父亲一起到京城,次年与弟苏辙一同进士及第,六年,又应制科考试,列为三等。熙宁四年(1071),官至太常博士,此时,正值王安石变法,苏轼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不同意王安石的一些措施,因而被放外任,通判杭州,后又知徐州、密州。后来,朝廷御史台有人居心不良,罗织罪名,诬陷他以诗讥谤朝廷,被扣“狱”,酿成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几欲丧命,出狱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尽废王安石的新法,任用旧党首领司马光为宰辅,苏轼因“属于旧党”而被召

回朝廷,连续升官,最高时做到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成为皇帝的近臣。但苏轼在多年的贬谪生涯中,了解到王安石的新法有许多好处,不同意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主张,与司马光发生了冲突,于是又被放外任,历任定州、杭州、扬州等地的知州。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再次遭到迫害,先被贬惠州,继而被贬到天涯海角的琼州(今海南岛)。三年后,徽宗即位,苏轼病逝于被赦北归的途中。苏轼一生纯白,了无机心,时时处处都以国计民生为己任,一生屡遭贬谪和陷害,但始终不渝,并在贬官期间为当地百姓做了大量好事,从而树立起了崇高的人格。

苏轼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人政治”的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苏轼的特殊的人格。苏轼处于魏晋时期和明中叶的两次“人的觉醒”的中间,历史的撞击使他登上了传统士大夫人格的最高峰,他的一生在中国士大夫人格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是“文人政治”时代人格自觉的典型。

在中国士大夫的政治演生的历史进程中,宋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自从汉武帝从政治意识形态上把帝王与圣人集于一身、政教合为一体之后,中国的士大夫便开始了明确的抗争。汉代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从政治的角度讲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正直官吏与专权的宦官、外戚的斗

争,但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就可以看出,实际上是对“王圣”观念的抗争和冲击,是在争取学统尤其是道统的合法地位。在这方面,唐代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汉代,唐代的多次朝政改革主要是出身庶族的下层士大夫为了争取政治出路——同时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要求削弱皇帝的特权和宦官、外戚等官僚集团的权力,由于唐代的封建制度比较成熟,政策调适得比较好,因此没有发生汉代的“党锢之祸”之类的事。然而,这种斗争的模式仍然是庶族士大夫要求削弱皇权的斗争,与汉代的“党锢之祸”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姑且把汉唐政治叫做“皇权政治”。到了宋代,其情形大有改观,宋初的帝王乃至两宋的帝王鉴于前代的灭亡的教训,都非常重视庶族文人,事实上,经过唐代的消化,宋代已经完全没有有了六朝以来的门阀士族观念(而这种观念是盛行于唐初甚至贯穿于整个唐代的),所以,宋朝的士大夫基本上没有士、庶之别的观念。应该说,中国历史发展到宋代,封建政治、经济、文化都进入了十分成熟的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民主时期”。与唐代相比,宋代朝廷中的官僚集团的特点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晚唐的牛、李党争近四十年,两派相互倾轧陷害,完全靠皇帝的信任来压倒对方,并不是为了什么共同的政治主张而结

成政治集团，所以其性质是争权夺利，比王叔文等人的团结同道、改革朝政、争取权力远远不如。北宋的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等时期的确也形成了一些官僚集团，但他们基本上是以各自的观点为依据来选择自己的归属的，其间的争论也基本上是平等的。这其中当然不排除宵小得势，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些政治集团及斗争的新的性质。“朋党”一词，在宋代以前是讳莫如深的，在宋代还是令人戒惧的话题，张溥说：“仁宗景祐三年，戒群臣越职言事。宝元元年，戒百官朋党。庆历四年，戒朋党相讦。数年以来，揭之诏书，惟恐人言。以恭己乐受之君，念诽谤妖言之律，岂其中心哉？宰相主之，左右助之。天下所非，谓之孤立，天下所是，谓之朋党。虽甚神圣，或暴或寒，莫能自必也。”（《宋史纪事本末》卷29）然而对朋党的戒惧恰恰反衬出时人对朋党的坦然的态度。当范仲淹被人指为“朋党”之时，他就曾对仁宗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上鉴辨之耳。”朋党一事在北宋不仅可以公开谈论，进而成为辩论的题目，甚至公开承认自己属于某党，其开明是前无古人的。北宋之初的王禹偁就写过一篇《朋党论》，认为君子、小人各有其党，而且“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只是由于“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

也”，其大胆和犀利，有振聋发聩之感。但后来的欧阳修被人指责为“朋党”，他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觉得王禹偁的《朋党论》不够深入，又写了更为著名的《朋党论》。欧阳修在文中列举史实、针砭时弊、训斥天子，尽颂君子之朋，痛贬小人之党，均可谓无所顾忌、痛快淋漓。

纵观北宋初年、庆历新政、熙宁变法以及元祐更化等政治改革、变动时期，可以看出，此时的士大夫所考虑的已经不是如何削弱皇权，如何取得皇帝的宠信，而是考虑如何征服持不同政见者，在皇权的统治下，除了元祐更化时期小人党政、迫害异己外，一般说来此时的士大夫是相对自由、平等的，因此，这就形成了与唐代不同的政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政党的性质，姑且称之为“文人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文人政治”对传统士大夫人格塑造的最大影响就是创造力的自由发挥。

苏轼的一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黄州时期和岭海时期。早期的思想尚未成熟，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黄州时期则基本上建立了自由人格。所谓自由人格，是指他对现实的超越与执著的生活态度，即不做“散人”，也不做“拘人”，对于“兼济”和“独善”两种人生方式，都不从主观上要求外在社会准则的认同，而是建立在心理主义的基础上，成为丰富自我、发展自我

的两种手段。而到了岭海时期，苏轼则到达了人格上的天地境界，这种境界，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审美人生。

“文人政治”的时代给苏轼提供了施展政治抱负的天地，因此，苏轼在入仕之初政治热情是很高的，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论说文。宋代取士以策论为主，苏轼在科举应试时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表达他的政治主张的策论。在文中，苏轼主张对是否当赏而疑惑不决时就要赏，对是否当罚而疑惑不决时就不要罚，表现了他的刑赏要以忠厚为本，要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在参加“制科”考试时，他写了《进策》一组文章，由二十五篇文章组成，其中《策别》中的《教战守策》是十分有名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当今生民之病”，“在于知安而不知危”的现实状况，通过确凿的论据和严密的论证，阐明了教民习武备战的必要性，是一篇切中时弊，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论文。其实，苏轼的《进策》可以看作是整个北宋王朝社会问题的全面反映。苏轼在入仕之初就有这样的见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此外，在朝廷和地方为官时，苏轼还上了许多奏章，如《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和《议学校贡举状》等，大都是指陈时弊、剖析利害之作。苏轼的史论也写得很有特色，如《贾谊论》一反前人对贾谊遭遇的同情，认为贾谊遭贬是他自己不善于处理政务和与

汉文帝的关系,是因为才大而量窄;《留侯论》通过分析汉代的张良和春秋时期的勾践成功的过程,得出了善于忍一时之忿才能成就大事的结论,并驳正了前人对黄石公和张良的看法;《晁错论》中对晁错的看法也有与前人不同的地方。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道路上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被贬黄州以后,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答李端叔书》)他的思想相对于前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论在对待佛老、心灵,还是在对待社会、现实方面,都与前人不同,而是得时代风气之先,建立了自由人格。

“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是他对待佛老及心灵的态度。首先,苏轼“归诚佛僧”是为了建立更加旷达和洒脱的人生态度。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概述了他初到黄州学佛时的缘由和心理,他说:“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得罪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焚香独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但他这并不是“痛改前非”,“诚心归佛”,而是用一种十分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激之情。事

实上,苏轼一生都没有陷入宗教迷狂,而是以充分的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宗教,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仅是借佛教的思维方式对现实人生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思考,他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子,待饱熟睡,腹摇鼻息,当恁么时,可谓无一丝思念,岂可谓猫儿狗子已入佛地?”(《与子由书》)这无疑是对禅宗末流的痛斥,也是对人生的理解,且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思想,也开启了他的岭海时期的天地境界的先河。第二,他拜佛读经,既非为了自度度人,也非为了尊佛佞佛,而是为了追求实用。他在《答毕仲举书》中说:“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如饮食龙肉,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苏轼对陈述古的大而无当的屠龙之技深为不屑,他把超世绝俗的佛教哲学赋予了世俗的色彩,将其改造成富有现实实用性的思想,并付诸实践。这段话还等于宣布了他不相信佛教,苏轼不相信佛教还要拜佛读经,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是他的高明之处。三,他对待佛教的态度十分谨慎,对学习佛教所容易

导致的懒散和放逸，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答毕仲举书》说：“学佛老者，本期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他常“自疑”以自我检索，并以自诫诫人，可谓用心良苦。

《雪堂记》则通过“客”与“苏子”的辩论，充分展示了他对道家的态度，“客”是一位真正的道家信徒，他认为“夫势利不足以为藩也，名誉不足以为藩也，阴阳不足以为藩也，人道不足以为藩也。所以藩予者，特智也尔。”并指出苏轼建雪堂，绘雪壁，“非徒无益，而又重子蔽蒙也”，进而要邀请“苏子”作“方外之游”。而苏轼不愿意作方外之士，他说自己建雪堂、绘雪壁的目的是为了“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既无炙手之讥，又免炊冰之疾”，相形之下，“彼其趑趄利害之途，猖狂忧患之域者，何异探汤执热之俟濯乎？”这就是说，苏轼学佛学道的目的不是为了做“散人”，而是为了祛除现实儒家思想中庸俗萎琐的一面，从而建立更加通脱旷达的人生观。

综上所述，苏轼参禅悟道，并非为了超凡入圣，而是为了撷取各家的精华，构建新的人生准则。他在《雪堂记》里说的一句话，最能概括这一特征，这就是“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他以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人生进行了形上超越，这种超越，把

儒家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道家的“齐一万物”，以及佛家的“四大皆空”、“万法平等”等易于导向消极的思想赋予了积极的内容，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理论根据，培养了他的不懈不躁，不惧不馁，任真自适而又观照现实的自由的人生品格。

超越与执著，是苏轼对待现实的态度。苏轼被贬黄州，生计窘迫，微薄的官俸不足以养家糊口，同历代遭贬的封建士大夫相比，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亲身参加了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东坡八首》述说了他垦荒的缘由以及“垦辟之劳，筋力殆尽”的劳动状况。如果不能执著现实，他是不会在劳动中体味到快乐，并表现出对生命的热爱之情的；如果不能超越现实，摆脱世俗的偏见，他是不会从事垦荒、建房等艰苦的体力劳动的。这种执著和超越在苏轼那里得到了统一，他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待体力劳动，将其赋予了浓厚的形上色彩，才使普通的劳动有了新的意义，也使他的这种劳动与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有了质的区别。在苏轼看来，这种劳动既不同于道家的归隐田园式的自命清高、沽名钓誉，也不同于儒家落魄潦倒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局促人生，而是一种安时处顺、任其自然的人生经历，是一种摆脱世俗功利和肉体痛苦的纯粹的生命活动，因此就有了形上本体的意